

# 紅樓“綠地”

## 駢字騫

在上個世紀的 70 年代初，曾經有過兩次值得寫進學術史的考古發現：

一次是 1972 年 4 月對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的搶救發掘。該墓出土了 4 942 枚漢代竹簡，其內容除現有傳本書籍的《孫子兵法》、《六韜》、《尉繚子》和《晏子》等先秦古籍外，還發現有前所未見的《孫子兵法》佚篇、《孫臏兵法》、《守法守令十三篇》、論政論兵、陰陽時令占候等佚書。其中《孫臏兵法》竹簡的出土，不但使失傳二千年的古佚書重見天日，更重要的是由於《孫臏兵法》竹簡的出土，困擾了中國人上千年的《孫子兵法》的作者到底是孫武還是孫臏的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

另一次是 1973 年對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搶救發掘。該墓出土了大批帛書和醫簡以及記錄隨葬物品名稱、數量和各種物品的分類遺策。尤其是其中的大量帛書，是繼 1942 年在湖南長沙東郊子彈庫楚墓中被盜掘出土的戰國“楚帛書”以後，我們今人又一次見到的古代帛書。帛書大部分寫在寬 48 釐米的整幅帛上，折疊成長方形；少部分書寫在寬 24 釐米的半幅帛上，中間用木條將其卷起。這些帛書出土時都已嚴重破損，經整理，知共有二十八件。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二書有今本傳世外，絕大多數是古佚書。此外還有兩幅古地圖，這些古代典籍資料都是中國考古學上前所未見的重大發現。

銀雀山和馬王堆的兩次重大發現，在當時不但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的極大關注，也引起了國家的極大重視。那時正處在“文革”末期，學習研究之風尚未恢復，科學發展的“春天”還沒有到來，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仍處在舊式體制的管理和約束之下，當時毛主席號召批林批孔批《水滸》，高級幹部讀《紅樓夢》，學術研究根本提不上議事日程。

為搶救這一批“搶救發掘”出來的珍貴文物，國家文物局緊急從全國各有關單位抽調了一批當時知名的考古、歷史、文獻、古文字學界專家，有的學者甚至是剛從“牛

棚”中硬“拉”了出來,集中到北京皇城根下五四大街二十九號文物出版社所在的“紅樓”裏,開始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出土文物進行整理和研究。一時這裏“春色滿園”,用李學勤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形成了一塊與周圍環境很不諧和的學術‘綠地’”(見《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序)。

那一年,據說北京大學中文系為響應有關部門關於加強培養古文字人才的建議,決定在我們古典文獻專業實施落實,但當時學校尚未具備設班招生的條件,於是就指定在我們班先挑選兩名學生來培養。有時候幸運總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從天而降,在系、專業兩級領導和老師的推薦下,我和李均明同學有幸被選中,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豈肯放棄。於是,秋季一開學,我們就跟隨中文系教授朱德熙、裘錫圭兩位大師到文物出版社去參加銀雀山漢簡和馬王堆帛書的整理工作,在實踐中開始了我們研習古文字的生涯。

我記得當時前後參加過銀雀山竹簡和馬王堆帛書整理的學者有故宮博物院的唐蘭、羅福頤、顧鐵符先生,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史樹青先生,湖南博物館的傅舉有、周世榮先生,北京大學的朱德熙、孫貫文、裘錫圭先生,中國社科院的張政烺、李學勤、馬雍先生,中山大學的商承祚、曾憲通先生,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的傅熹年先生,中國醫史文獻研究室的馬繼興先生,四川博物館的于豪亮先生,以及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湖北省沙市文化館的李家浩先生。除了我們外,其中大部分人是當時國內考古、歷史、文獻、古文字學界的頂級人物,他們除了有淵博的文化知識外,還有豐富的整理和研究古文獻經驗。這些文物是當時搶救性地發掘出來的,而對它的整理照樣需要這樣一批人來搶救性地進行整理和研究。

當時的工作是由國家文物局指派文物出版社具體來組織和管理的,出版社破例把我們和從外地調來的學者安排在紅樓的地下室居住(因為紅樓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按規定是不許住人的),在文物出版社的職工食堂吃飯。我們上下班就是樓上樓下,非常方便;而北京有家住在紅樓外的學者們,有的上下班是用小車接送,這在當時算是“很奢侈”的生活了。前面已經說過,那時還處在“文革”末期,一切尚未恢復正規,能進入小組的學者們無不以此機會而感到慶幸,每個人好像又找回了“文革”前讀書研究的感覺,個個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這在當代學術史上也是一件值得記載和紀念的事。

彈指一揮間,銀雀山竹簡和馬王堆帛書的出土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是歲月掩不住歷史的記憶,三十多年前發生在文物出版社的那一幕幕,不時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那時,我們在紅樓三層東邊朝東的辦公室辦公,辦公室很寬敞,並配有基本的工

具書，如果需要查參考書時，可到國家文物局圖書館借。一開始，我們是熟悉竹簡，然後就跟着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學習釋讀竹簡上面的文字，在實踐中學習古文字知識，同時也學習對殘斷竹簡的拼接、綴聯和整理等工作。

以前我祇是在書本上接觸過有關古代竹簡的記載，但一直沒有見過竹簡的實物。我這次見到的竹簡，已經是經過清理並裝在密封的玻璃管子裏，給我最初的印象是玻璃管子裏裝著一根根長條狀的黑乎乎的東西，上面寫着和現在通行漢字大不相同的漢代隸書，有的比較規整，有的比較潦草。據當時參與發掘出土的人講，這批竹簡出土時是和污泥混合在一起，由於年代久遠，竹簡變得非常柔軟，就像煮熟的麵條一樣，可以隨意彎曲，而且也非常容易破碎。竹簡出土後要進行科學的清理，把竹簡清理乾淨後，就要對竹簡進行編號和拍照，然後用兩根玻璃條夾住再捆好，最後裝在一根裝滿防腐蒸餾水的玻璃管裏。完整竹簡的長度大致在 30 釐米左右。因為竹簡出土前長期浸泡於泥水之中，發掘前又受到盜墓人的人為破壞，儘管後來經過專業工作者的科學發掘，但殘斷現象十分嚴重。加之字迹漫漶不清，恢復、整理的困難之大可想而知。

我參加的是銀雀山漢簡的整理工作。記得一開始我們整理組首先利用竹簡照片從簡的形制下手，即把四千多枚簡中同一形制的先分開，因為同一形制的簡原來應該是編聯在一起的；然後再把同一形制簡中不同書法風格的分開，因為書法風格相同的簡原來可能為一人抄寫；然後再把文字內容相同或相近的分開，因為文字內容相同或相近的簡原來應該屬於同一類書中；這就是所謂的篩選法，或者叫排減法。即在大的相同者中分出小的不同者，在小的不同者中找出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再根據這些細微差別把它們一層一層地分開，最後差別很小或沒有差別的就歸在了一起。然後就是將歸在一類裏的一些殘簡斷簡進行綴聯。再下來就是根據每枚簡的文字內容來確定它們的歸屬、排定它們的順序，這時就基本接近了原簡冊的面貌，這就是當時整理出土竹簡的基本過程。通過這些實踐，整理組也總結出一套整理出土竹簡的經驗，直到現在，這套整理經驗仍在被大家使用。當然隨着以後簡帛的不斷出土，這套經驗也還在被大家不斷地補充和完善。

整理、分類的工作完成以後，我又參加了一些《孫臏兵法》的注釋工作。

出土的《孫臏兵法》有一萬一千餘字，整理組首先是將竹簡上的漢代隸書釋寫成現在通行的文字，然後排列竹簡順序，最後是對《孫臏兵法》的文句進行簡明扼要的考證和注釋。這一工作主要是由朱德熙、裘錫圭等先生在主持，我們祇是在學習中參與了一些工作。其成果就是 1972 年由文物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的 32 開平裝本《孫臏兵法》。

在這一期間，還發生過一件讓我們最難忘懷的也是外人所不知的重大事情，那就是據說是為中央首長們編輯大字校注本《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那時，中央首長們也很想看到失傳幾千年的竹簡本《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於是上級下達任務，責成整理組來完成此事。這在當時來說是神聖的，也是唯此為大的。上級催得很緊，凡參加銀雀山漢簡整理工作的老先生幾乎都參加了這一工作。那時參加銀雀山漢簡整理工作的專家學者們大部分已年過半百，有的已到杖鄉之年或杖國之年，最年輕的專家就是不惑之年的裘錫圭和曾憲通老師了。這些人鼓足幹勁，不怕犧牲，加班加點，來爭取“勝利”。我記得後來印出來的樣書是八開大的宣紙綫裝本，每頁豎排十一二行，字形大小用的是老初號仿宋，字體用的是繁體，藏藍色布料封面，美觀大方，古樸厚重，十分講究。因為此書是專為中央首長編輯整理的大字校注本，屬於非賣品，印數極少，在市場上根本看不到。時至今日，這種版本的《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已成為極具價值的收藏品。

之後，我又接受了竹簡本《晏子》的整理和校註工作。這也是當時老師佈置的實習作業。那時整理組同志們手邊的工作都有分工，佚書和難整理的書由先生們來做，而我們接受整理的是有傳世本的比較容易做的工作。

《晏子春秋》是記述春秋時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嬰言行的一部著作。傳世本《晏子春秋》共存八卷，包括內篇六卷、外篇二卷，共計二百一十五章，章章有篇題，全部由短篇故事組成。全書通過一個個生動活潑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嬰和眾多陪襯者的形象。而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本《晏子》與傳世的《晏子春秋》大不一樣，僅存一百零二枚簡，分為十六章，其內容散見於傳世本《晏子春秋》八卷之中的十八章內，每章各自起訖。原簡冊沒有篇題。有人認為簡本《晏子》十六章可能是個摘抄本。從內容上看，竹簡本《晏子》與傳世本《晏子春秋》，不但在文句上有所差異，而且在篇章分合上也不盡相同。如簡本第十章，今本析為《內篇問上》之二十和二十一兩章；簡本第十一章，今本析為《內篇問下》之二十二和二十三兩章。過去有人懷疑《晏子春秋》是偽書，或成書較晚，但簡本《晏子》的出土，證明它的成書應在戰國時期，漢初由劉向編定，流傳至今。

我接受了對竹簡本《晏子》校註的工作後，首先是對傳世本《晏子春秋》的各種版本和古今人對《晏子春秋》的考證、注釋書仔細摸索了一遍，搞清了這些情況後纔開始按照簡本的內容收集相關資料，搞了個初具規模的“資料長編”，然後纔進行逐句逐字的考證和注釋工作。一開始，我把收集到的有關資料幾乎都給堆在了稿中，還自認為引經據典，有理有據。結果交給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審查時，兩位先生認為我搞得有點“超過要求”，與校注體例不是特別密切的資料，完全可以刪除。起初我認為好不容



易收集了那麼多的材料，覺得棄之可惜，放在裏面，儘管有點囉嗦，但讀者可以看的更加清楚。後來兩位先生說，這是搞“簡單校注”，而不是搞“校釋”或“集釋”，要捨得割愛。這使我頓開茅塞，原來是自己把工作的性質搞複雜了，同時也明白了“校注”和“校釋”、“集釋”的差別所在，並不是材料越多越好。真是“聽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於是我按照老師的指點，對我做的原稿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改，幾乎刪掉原稿的一半之多。回頭再看修改稿，就像做了一次徹底的“減肥”工作，新稿子眉目清秀，不但使內容更加簡單明瞭，而且也突出了“校注”本的特點。這是我第一次在老師的指導下撰寫書稿。雖然一開始走了點彎路，但是終身受益，為以後我的工作和寫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次我做的《晏子校註》(草稿)，後來在朱德熙、裘錫圭先生修改補充後收進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公開出版發行的八開精裝本《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之中。

在這一期間，我還有個意外的收獲，那就是在整理工作中，我發現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中的“異”字和《孫臏兵法》2024 號簡上的“選(選)”字裏面“異”字的寫法與戰國時楚國貨幣“鬼臉錢”上的那個文字(𠄎)寫法極為相似。我覺得“鬼臉錢”上的那個字應該釋為“異”字。於是我又查了好多資料，反復比對，在稍有把握時就去徵求朱德熙和裘錫圭老師的意見。我記得，在請教朱德熙先生時，他興奮地拍案而起，拍了拍我的肩膀，連聲說：“就是它，就是它。”朱德熙先生是當代語言學家、古文字學家，是第一等聰明人。他記憶力強，悟性高，做事和研究一樣，一板一眼，井然有序，平時“話不投機半句多”(朱師母何孔敬著《長相思》語)。他這麼一說，真讓我感動不已，頓時使我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是好。這下就更堅定了我對這一文字考釋的信心，力爭揭開“鬼臉錢”這一千年之謎的面紗。之後我從多方面收集材料，在字形和字義方面進行了多角度論證，最後寫成了我的第一篇古文字論文《試釋楚國貨幣文字“異”》，於 1986 年發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華文史論叢·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中。這篇論文一經發表，就得到社會和學界的認可，直到現在，一直在被學界所稱引。

在紅樓的那段時間裏，我的任務主要還是以學習為主，以工作為輔。當時在那塊與周圍環境極不諧調的學術“綠洲”裏，雲集着那麼多的大師，在他們身上有着學之不盡的知識和精神。這是我第一次與這麼多的大師近距離相處，機不可失啊，於是就夜以繼日地拼命學習。我感到，一個人要想真正成功，要想真正求得知識，一定要靜下心來。於是每天從國家文物局的圖書館裏借好多書，晚上在宿舍裏看，幾乎每天晚上都在一兩點鐘纔上床休息。那時我有兩個厚筆記本，一個是專門用來收集資料的，如有重要的內容就抄下來；另一個是用來記疑難問題的，對不懂的就記下來，第二天再向大師們請教。

那時，國家文物局圖書館的管理員是杜仙洲先生，他是文化部文物保護研究所的

老一代古建築專家,或許是因為他還未解脫“文革”的管制,所以纔讓他在圖書館裏管理圖書。這個圖書館內有很多和我們專業相關的書籍,而且有很多很多的綫裝書,杜先生對我們特別熱情,我幾乎每天都要去圖書館借書,但他從來沒有一點反感,有時他還對我借書的品種進行指導,而且破例允許我一次借好幾種書,冊數不限。也許是在那個年代,他也很少看到能有如此刻苦的讀書年輕人,出於對“讀書人”的一種愛護和偏好,所以對我們大開綠燈。那時我纔二十七周歲,身體原本非常結實,但在那一年,卻被搞得狼狽不堪,真還有點吃不消。我記得《孟子》裏邊有句話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大任”雖然沒有降臨我的身上,倒讓我吃了不少苦頭,但我始終認爲那是在“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說句心裏話,這一年雖然“苦”了一點,但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的年代,其中的快樂祇有“讀書人”自己的心裏最明白。

現在回想起我在紅樓的那些日子,仍然歷歷在目,使我永遠不能忘懷。我有幸先睹了那些偉大的發現,並參加了對它的整理工作,使我受到了終身的教益;與那麼多大師朝夕相處,英華照眼,五彩繽紛,讓我感受到他們身上那些不爲常人所感知的獨特品性,我感激他們從不同風格、不同途徑給了我不同的楷模,讓我去仰慕。他們影響着我的一生。大師之“大”,不僅在於他們能夠取得大成就,關鍵在於他們有大造詣、大胸懷、大視野、大精神、大氣魄!我和他們有緣相處,或許正是上帝“曾益我所不能”的良苦安排,那段生活的意義也許就在這裏,但又覺得遠遠不止於此。

當時我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如今我也年過花甲。往日一起工作的先生們多數已經作古,在此我深深地鞠一躬,以寄託我對他們的哀思。

(駢宇騫 中華書局編審,北京市大興區黃村  
永華南里翰林院7號樓1單元801室,102600)